

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從文獻探討中得知，依據Ivaschenko低所得國家降低不均度有利經濟發展的觀點，以及基於經濟公平的看法，俄羅斯將所得不均的程度維持在較低的水準，會較有利於國家經濟的成長和社會穩定。但當俄羅斯開始由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時，所得不均不但沒有維持在較低的水準，並且在轉型初期呈現大幅提升的現象，不論是跟同時期其他轉型國家或中所得國家比較，所得不均程度以及所得分配惡化的速度都相對較為嚴重，雖然1995年之後相對於轉型初期所得分配狀況略有改善，但在轉型國家當中，吉尼係數仍僅低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高居第三的位置(參閱第44頁，圖3-4)。

俄羅斯在轉型前的1991年貧窮人口為610萬人，而在開始實行轉型政策後的1992年貧窮人口暴增為5020萬人。¹換言之，俄羅斯轉型期間所得不均擴大是建立在多數人貧困化的基礎之上。若仔細分析整個轉型時期內所得結構變化，可以發現所得不均擴張主要是來自於高所得階層所得增加以及低所得階層所得減少，這種兩極化所得分配代表所得不均的成因並不是中產階級靠著自身專業知識或技術以增加產出的方式累積財富，而是由於高所得階層可以藉由原本的優勢，透過競租套利、非法手段以及其他非市場行為，將其本身的政治優勢在轉型過程中轉化為貨幣財富所得。

因此，若由政治權力可轉化為貨幣財富所得這個觀點，重新檢視轉型以前俄國所得分配，那麼俄國貨幣所得分配均等僅是表面的現象，因為轉型以前俄國普遍存在官僚特權以及黨國精英領政的文化，此時期貨幣所得不均其實是隱藏在政治特權之內，經濟轉型只是將此特權轉化為貨幣所得，並使得不均浮現表面化，致使以吉尼係數和所得倍數測量之不均度指標比共產時其嚴重。

¹ 徐元宮，「轉型時期中俄貧富分化及其對策比較」，《俄羅斯研究》，上海：俄羅斯研究中心，2004年第4期，頁59。

造成政治權力可轉化為貨幣財富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政府不公平的私有化政策。在進行私有化時，具有政治權力者可以透過貪污獲取所得，並且具有政治權力的階層與財團以及勾結，低價賣出國有企業給財團造成財團的資產暴增，本身也能從中取得利益，此外，在進行企業私有化時，內部關係人尤其是經理人原本就因為資訊不對稱而較具有優勢，但是政府不但沒有設法降低這種優勢，反而因為無法承受來自經理人等利益團體的遊說壓力，而修改原私有化方案以提供對經理人更具有優勢的新方案，造成經理人透過這種競租行為讓財富快速增加。因此政府的私有化政策，由原先希望讓全民無償平均分配國有資產的目標，最後變成財團私有化以及獨厚經理階級的結果。

政府在進行自由化時，並未作好健全的配套措施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而惡性通貨膨脹透過所得重分配效應造成貧窮階層的財富下降，並且讓高所得階層更有能力購買低所得階層的資產。

產業薪資消長的差異化，使得職業類別也成為決定俄國社會所得分配不均狀態的因素之一，也使得俄國社會階層之分佈圖像有所改變，因此，薪資自由化後造成產業薪資以及產業結構的改變影響所得分配，就業類別改變引發薪資不均終致所得不均。並且，失業率的上升造成低所得的貧窮階層所得下降。

穩定化政策受到過多政治力的影響，造成政府貨幣及財政政策呈現擴張及緊縮交替的現象，導致前述的通貨膨脹所得效應進一步加深。緊縮的財政政策造成財政嚴重負擔，迫使政府發行超高利率的公債，使得有閒置資金的高所得階層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此外，政府移轉性支付支出過低及社會救助政策效無效率，使得所得不均情況無法有效改善。

綜觀俄羅斯經濟轉型的政策，導致富有階層所得提升和貧窮階層所得下降，社會結構中的中產階級人數減少，呈現「M型社會」的發展趨勢。然而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模式是中間階層占多數，愈往所得兩極人口比例越少的「

鐘型分配」，而不是這種「M型分配」。²身為前共產主義國家自然很容易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由於轉型之初，主要追求的目標仍是經濟成長與經濟效率為主，因此，相較之下難免較忽視所得分配等經濟公平議題，因而造成俄羅斯社會貧富差距兩極化的狀況。

然而自1999年起，俄羅斯追求經濟成長的成果開始展現，而2000年上任之普欽(Vladimir Putin)總統也表示要加強社會保障政策³，並致力打擊私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金融寡頭。

普欽並不追求經濟政策上的最大自由化，認為政府應該保有適當的干預手段，基於這樣的基礎下提出建立「面向社會的市場經濟」⁴。針對轉型以來在所得分配產生的嚴重問題提出了「強國富民」的政策目標，換言之，除了透過經濟改革促進經濟成長達到「強國」目標外，同時，加強社會保障政策以達到「富民」的目標。在此強國富民政策下，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有：(一)改變社會保障基金的形成方法。(二)養老保障模式由現付現收制逐步改為部分積累制。(三)使非國有養老基金加入強制性養老保險體系。(四)繼續實行養老金指數化。(五)提高養老金數額。(六)強制性醫療保險。(七)失業保險的改革。⁵

但這些有助於改善一般被視為社會中所得弱勢者，如領養老金者與失業者狀況的社會政策卻沒有產生明顯效果，由下表5-1可以觀察到，普欽上任時的吉尼係數為0.399，到2006年為止，僅2001年與2002年的吉尼係數低於剛上任當年之數值，並且除了2005年吉尼係數下降外，2001至2006年的吉尼係數都是呈現惡化趨勢，所得倍數也由2000年的13.8倍上升到2006年的15.3倍。

² 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在《M型社會》一書中，以「M型社會」一詞形容社會中所得兩極人口增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造成中產階級減少的現象。參閱：大前研一，劉錦秀、江裕真譯，《M型社會》，台北：商周文化，2006年。

³ 許新，前揭書，頁219至232。

⁴ 意味：在建立自由市場機制同時，將更加注意經濟穩定以及社會保障。

⁵ 許新，前揭書，頁215至229。

相較而言，經濟成長成果卻十分明顯。自2000年起，除了2002年的實質GDP成長率為4.7%外，其餘每年經濟成長率皆高於5%，同時，人民的實質可支配所得除2001年外，其餘每年都呈現雙位數的成長，並且物價膨脹年變動率相對於千禧年之前始終保持相當穩定，未再持續惡化。

表 5-1：1998～2006 年俄羅斯主要經濟社會指標

年度	吉尼係數	最高最低 所得級距 倍數(十分 位)	實質GDP 成長率	實質可支 配貨幣所 得年成長 率	物價膨脹 年變動率
1998	0.379	13.4	-5.3	-	27.6
1999	0.399	14.0	6.4	-	86.1
2000	0.399	13.8	10.0	12	20.8
2001	0.396	13.8	5.1	9	21.6
2002	0.398	14.0	4.7	11	15.7
2003	0.402	14.5	7.3	15	13.7
2004	0.409	15.2	7.1	10	10.9
2005	0.406	14.9	6.4	11	12.7
2006	0.410	15.3	6.7	10	9.7

說明：

1. “-”代表資料缺乏。
2. 吉尼係數為俄羅斯中央銀行依據個人實質所得計算。
3. 物價膨脹依據年平均消費者物價計算。

資料來源：

1. 吉尼係數與所得倍數：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бан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1999
Таблица 6, с.176; 2001, Таблица 7, с.186; 2004, Таблица 9, с.200;
2006, <http://www.cbr.ru/publ/main.asp?Prtid=God>, 2007. (Central Bank of
Russia, *CBR Annual Report 1999; 2001; 2004; 2006*, extracted on 15th
September 2007.)

2. 實質 GDP 年成長率和物價膨脹年變動率：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elected economic indicator data,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sei.xls>, extracted on 1st April 2007.
3. 實質可支配貨幣所得年成長率：Russia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Russian in Figure, Living Standards of Population, Main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living standard of population, http://www.gks.ru/free_doc/2007/b07_12/07-01.htm, extracted on 15th September 2007.

初步觀察俄國近年經濟社會指標發現，已經轉型為市場經濟體的俄羅斯經濟，其成長確實傲人，所以被視為金磚四國之一⁶。然而，經濟成長期間所得分配不均現象並未產生改善。若對應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之各學派觀點，俄羅斯1998年後的統計數據並未顯示出經濟成長能夠降低所得不均度之相關性，而是較接近兩者同時成長的關係，此是否意味著所得分配差距擴大反而增加人民生產動機，因而成為轉型後經濟成長之有利條件？抑或是經濟成長帶來之所得分配效果抵銷普欽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上的成

⁶ 高盛調查報告指出，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合稱金磚四國)，將在2050與美國和日本成為世界六大經濟強國。See: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nsight/research/reports/99.pdf>, extracted on 15th September 2007.

效，還是普欽政府的社會保障制度初上路不夠完善，無法發揮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這些議題皆尚待深入探究。因此，1998年後的俄國所得分配狀況仍值得持續研究，不過觀察重點將不再是1992至1997年轉型期間的結構性因素和轉型政策影響效果，而應當是以市場因素和相關政策等方面作為主要研究方向。